

提问诸子丛书

黄坤明 主编

传统精髓·现代表达

提问吕不韦

弃商从政
著述春秋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立言可达不朽，
这在弃商从政的
理想主义者吕不韦身上
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上海人民出版社



提问诸子丛书 黄坤明 主编

提问吕不韦

弃商从政
著述春秋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提问吕不韦/郭志坤,陈雪良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7

(提问诸子丛书/黄坤明主编)

ISBN 978-7-208-14254-1

I. ①提… II. ①郭… ②陈… III. ①吕不韦(?-前
235)—人物研究 IV. ①B2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3134号

出版统筹 孙 瑜
责任编辑 龚 权
装帧设计 范昊如

· 提问诸子丛书 ·

黄坤明 主编

提问吕不韦

郭志坤 陈雪良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0.25 插页 4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254-1/B·1235

定价 58.00元

总序

黄坤明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yì)》）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

“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2010年春于杭州

提问吕不韦

前言

吕不韦，在先秦历史上，以至于整部中国文明史上，应该是个极为亮丽的生命符号。

在先秦，有诸多被冠之以“集大成者”的大师级人物，而最配得上这一称号的，看来就是吕不韦了。“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汉书·艺文志》）他不只把春秋战国期间数百年间诸子百家的精华采集起来，融会于一炉，还加以提炼，成之为“王者之治”的精品。说他所著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古典的王政全书”，毫不为过。

在吕不韦之前，百家人物或力主法治，或倡言德治，吕不韦站了出来，说：“你们说的都对，又都不全对！”他，吕不韦，想奉行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霸王道杂之”。吕不韦把法治与德治糅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一用就是两千年。

吕不韦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吕氏春秋·有始览》）其意是，天地万物虽各异，但像人的身体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着“大”的“同一”性。从此，中国文化中增添了一个崭新的、梦一般美好的、引人前瞻的语汇：“天下大同”。作为一种梦境，《礼记》中描述过它，太平天国的英雄好汉们践行过它，康有为在《大同书》的名义下追寻过它，连中国共产党人也认同它。中共领袖毛泽东说过“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如今建设的是“小康社会”，而“大同之世”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而《吕氏春秋》在子书中率先征引《孝经》一书，并大加张扬。说吕不韦开了有汉一代“以孝治天下”的先河，并不过誉。

就文化领域来说，吕不韦也功不可没。称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

父”，他的皇皇巨著《史记》稳居“二十四史之首”，那是谁都不会怀疑的。可是，又有谁知道，司马迁的鸿篇巨制却是取法于吕氏《春秋》的。清代文史大家章学诚明确而肯定地说：“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法也。十二本纪仿十二月纪，八书仿八览，七十列传仿六论，则亦微有所以折衷是也。”“折衷”云云，变通也。“法”与“仿”是基本的，“折衷”只是“微有”而已。

伟哉吕子，历史是不会忘记这样一位两千多年前的巨子的。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弃商从政.....	1
第二章 著述春秋.....	33
第三章 效法天地.....	67
第四章 孝治天下.....	99
第五章 兴王典礼.....	113
第六章 杂家之父.....	137
后 记	153



第一章

弃商从政

商人？不就是被大政治家管仲按“士、农、工、商”序列排在末位的商贾么？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能有多大的能耐和作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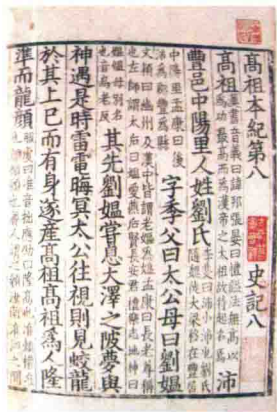
不！想当年，就是在兵连祸接的中华大地上，有几多腰缠万贯的大商巨贾，他们迎着呛人的火药味，冒着生命的危险，纵横天下，结驷连骑地活跃在列国的大城小邑。他们或以巨富显世，敢与王者埒富；或与权贵联袂，“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史记·货殖列传》）。吕不韦就是战国时期庞大的商人群体中出类拔萃的一员。

我们不敢妄断吕不韦是出生于一个世代商贾的家庭之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父亲是个商人，而且是个见过大世面、有过大阅历的商人。从现有的史料看，吕父带着他的儿子至少周旋于卫、魏、赵、秦等国之间，一面是经商，一面又与那里的上层社会有着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某种联系。当然，吕父主要的活动还在于经商，即使与各国权贵间有某些人脉交往，从主观意愿上看，还是为了赚钱和谋利。而在其父羽翼下渐渐成长起来的吕不韦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大胆地迈出了弃商从政这一步。通过与秦在赵国为质的异人的交情，一步步登上了秦国权力的峰巅……

在研究先生您的生平的诸多作品中，著名学者林剑鸣的《吕不韦传》是功力独具的。他在这部传记中一开头依据《史记》以及有关史料作了一大段文学性的场景描述，十分精彩。严肃的学术专著，一开头就这样大段的场景描写，您觉得有必要吗？读罢，人们一定会问：当年的华北大地为何气氛那样“凝重肃杀”？而商人打扮的年青人为何又是那样的“踌躇满志”？这些，您能作答吗？

吕不韦：我觉得，学者林剑鸣的描述是神来之笔。优美细腻的文学笔法背后隐伏着的是严肃而凝重的时代风云。可以说，当时大国争霸的形势尽在不言中了。

要问当时华北大地气氛为何那样“凝重肃杀”吗？要知道，在距今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华大地上有一百四十余国。经过长期的争斗，到战国时期，只剩下了十余国，能在政治军事舞台上角逐的只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世称“战国七雄”。到公元前三世纪时，情势大变。地处中原的韩、赵、魏三国都已衰弱。曾经号称“东帝”的齐国，在公元前284年经秦国为首的韩、赵、魏、燕、秦五国联军重拳一击，几至亡国。公元前260年长平一战，赵国四十万士兵被坑杀，再也无法与秦抗衡了。此时，秦国独强的局面已经形成，对山东六国来说，形势哪有不“凝重肃杀”之理？而在如此凝重到让人窒息的氛围中，我吕不韦，作为一个年轻的商贾，仍然“踌躇满志”地行进在邯郸的驿道上，那定然是与山东六国的败亡命运无涉了。如果我与六国王室的命运有什么瓜葛的话，我是怎么也轻松不起来的。



《史记》(宋代刻本)书影

《吕不韦传》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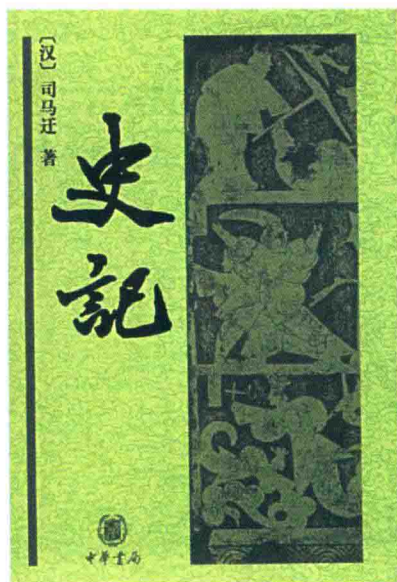


这里想插问一下您的生年。人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生存的,如果连生年都闹不清,那事情就只好办,很多问题就说不清。介绍人物总得让人明白最基本的“某某,某年某月生”。《史记·吕不韦列传》给了后人这样一个信息:“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既然是“当是时”,那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您是与战国“四君子”同时代的人。不过那样还不够具体,有无更具体、更可靠的生年时间可以确定呢?



司马迁像

吕不韦: 我的一生与秦王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可靠的是按秦王政的生年推定我的生年。秦王政是生于公元前259年(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的,这是史有明文的,那么,可以作这样的推算:如果秦王政生时,我是二十五岁,那么我的生年当是公元前284年了。这个年代很好记,正是秦为首的联军将“东帝”齐国打得难以翻身的那一年,而当秦国把另一强国赵国在“长平大战”中打得落花流水之时,我已二十五岁了。有了这样的时间坐标,我一生的作为都有较为准确的时间依托了。



《史记》(中华书局出版)书影

据我们所知，您是古代一个极有声望的家族的后代，其祖先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炎帝时代。作为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您的先祖因有功而封于吕地（今河南南阳一带），从此以吕为姓。在中国历史上以周文王师和《太公兵法》闻世的姜太公吕尚，就是您的八百年前的远祖。后来，吕尚因功封于齐，而吕姓集中居住的吕地，在周初仍被封为吕国。不论从吕尚的齐国看，还是从地在三晋的吕国看，到您出生时，都属行将灭亡的六国的地域范围。自己的母国行将灭亡，您怎么会那样的悠闲自在、视若无睹呢？

吕不韦：我在《吕氏春秋·遇合》篇中说过这样的话：“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我是说，凡是双方视为知遇的，那是因为合得来。如果一时合不来，那只能等到合得来再行动了。比翼鸟没有合伴就宁愿死在树上，比目鱼找不到好伴侣宁愿死在海里。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合”字。我的意思是，在六国那里找不到能“合”的君主的话，就到别处去找，“必待合而后行”，我寻觅着。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在《吕氏春秋》中多用“天下”一词，我在寻找“合”时，并不限于故国，我的目标是“天下”。



吕尚像

吕尚，姜姓，名尚，字子牙，其先祖伯夷掌管四岳有功，封于吕（今河南宛县），子孙以封地为氏，故名吕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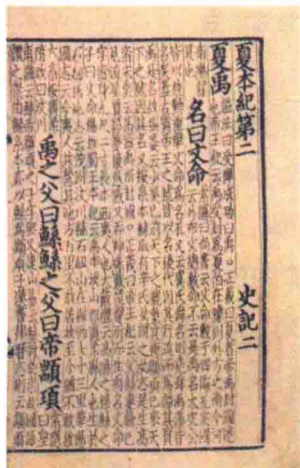
《吕氏春秋·遇合》书影

所以聖人不能不用之。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龍之用之，故不勝其任。任之不勝，則幸及焉。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苟則力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動，則力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遇得不苟。苟安凡能聽說者，必達於予。五聲也。通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遇。遇得不苟。苟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謬五聲無失也。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音說

七日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于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為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德不見大用，素至也。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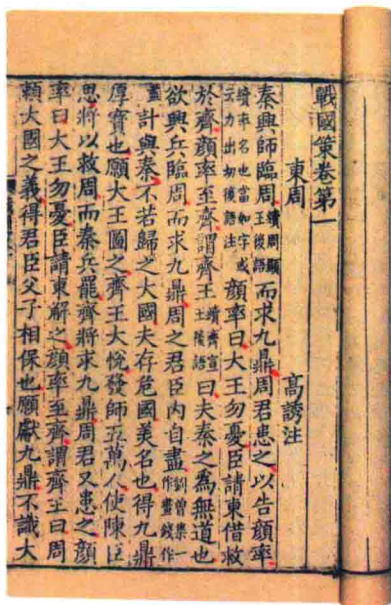
上面说到的吕地和齐地，那是祖上的吕姓所在地。后来，吕国也灭亡了，齐国也只是吕尚带过去的一脉。更多的吕姓人氏流落到了他方。您的里籍在哪里呢？这似乎是个谜。《史记》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也。”（《吕不韦列传》）而《战国策》则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秦策五》）洪家义在《吕不韦评传》中依据上述史料作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商人，迁居是常有的事。《史记》说的可能是原籍，而《战国策》说的可能是新居。”您以为此说然否？



《史记》书影

吕不韦：其实，《史记》与《战国策》各有各的讲法，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洪家义先生的论断刚好把意思弄反了。《战国策》讲的是我吕不韦的籍贯，即祖籍，“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意思是明确的，说我的祖籍在濮阳，只是后来在邯郸行商，语气肯定，语意明确。而《史记》写的是我早年的经营生涯，“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这是作为一个商人原始积累的过程，通过阳翟地区商场上的一番拼搏，我成了一个

“家累千金”的大商人。作为大贾，我是属于阳翟的。正如后人讲陈嘉庚先生是南洋巨商，可不等于说他的籍贯在南洋，其实他是福建人。



《战国策》书影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全书依次分国编写，分为十二策，所载历史，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为先秦历史影响最大，散文成就最高的著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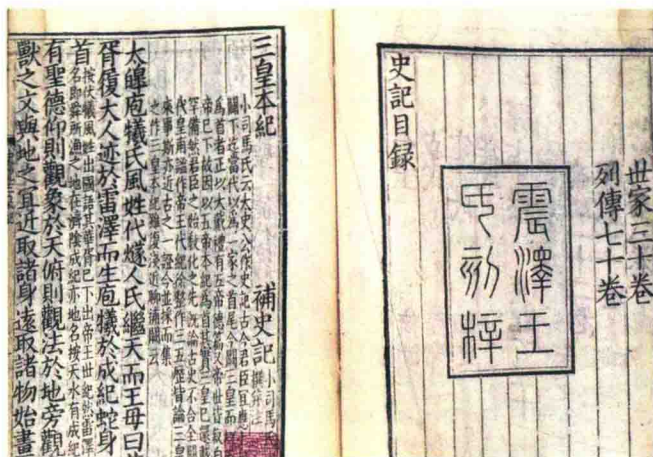
我们明白了，您是身为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的。据我们所知，濮阳可是个商业味极浓的大去处。濮阳实际上就是古帝丘，相传古帝颡顼（黄帝之孙）死后即葬于此。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濮阳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逐步成为中原水陆交通的中心之一。这对于您日后成为一个大商贾很有影响吧？



帝颡顼像

吕不韦：这种影响是当然的。但是，学者们往往忘记了经济之外的其他一些要素。濮阳与中原另一水陆交通枢纽陶（今山东定陶）相距只百里。“朱公（即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即在此“三致千金”的。定陶的兴盛，促成了濮阳的繁荣。濮阳属卫国，因此又简称卫。当时人乐于“陶、卫”并称。说我生于濮阳对我日后的商人气质有影响，一点也不假。

但是，还有一点是更为重要的。就在我青少年时期，秦国攻占了原属于宋国的定陶，将其纳入了秦国的版图。定陶与秦本土不连接，中间隔着个魏国（卫已并入魏）。过往秦本土与定陶之间，必取道濮阳，秦文化也渐次渗入到濮阳地区，也融入了我这少年人的心田。这样，我就会兼具秦魏两种文化，眼界之开阔也非他地人士可比了。后来陶地成了秦大臣魏冉的封地，这又给我与魏冉之间的交往架起了一座天然的桥梁。后来我选择魏冉之弟华阳君的女儿华阳夫人作为政治跳板与秦王室交往，这也是与地缘关系的亲近有关的吧！这当然是后话了。



《史记·三皇本纪》
（司马贞补撰）书影



夏禹像

您早年经商致富的地方是阳翟（今河南禹州）。阳翟既是商业要冲之地，又是文化名城。它是古夏禹国的所在地，有着诸多夏禹治水的传说和遗址。阳翟是当时最有名的瓷都，后来又一度是韩国的国都。您选择阳翟作为经商致富的第一站，是否就是冲着那里的瓷品交易而去的？

吕不韦：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那时就有诸多夏禹治水的传说。要知道，对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陶瓷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非常重要。我的故乡濮阳与阳翟只有百里之遥，我到那里去贩卖陶瓷，比起远道而来者来说，有着极大的地利优势。可能我父亲的经商发家地就在阳翟也说不定，

我只是继承了父亲的经商道路罢了。还有一层，也许是更重要的。阳翟在地域上更偏西，是韩国与秦国犬牙交互的地方。因此，那里虽属韩地，却有着更多的秦风。我的到那里去经商，是可以接受更多的秦文化的。



夏禹治水雕像

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号禹，后世尊称大禹。相传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是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

《史记》和《战国策》谈到您早年的行踪时，都提到了三处：一是濮阳，二是阳翟，三是邯郸。这三地分属三晋：濮阳属魏，阳翟属韩，邯郸属赵。这本身就说明您这个大商贾实际上实施的是当时的国际贸易。阳翟离您的故土濮阳只百里之遥，而邯郸则远在千里之外了，您为何舍近而求远，到那么远的邯郸去经商呢？

吕不韦：在当时，邯郸确是个好去处。邯郸的繁华，那是濮阳、阳翟都不能比拟的。这座赵国的首都始建于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元年），到我那时已有百年的历史。这里不仅是赵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可以南通郑、卫（今河南境内），北接燕、涿（今北京市附近），东连齐、鲁（今山东境内），无疑是各诸侯国中最大的商业城市。邯郸城规模宏大，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有开阔的通衢大道，有时髦而美艳的女子，有儒雅地步行在大街上的男子。《庄子·秋水》篇中说到，当时远道而来的风流少年，看到邯郸人走路姿势那样优美，刻意仿照，结果回去路都不会走了，只好爬着回去。虽说是寓言类的故事，但多少也反映那儿的实况。当时虽是战乱岁月，但是人们的趋时心态一点也没减弱。作为好冒险的青年商人来说，我哪有不到邯郸之理？



《庄子·秋水》书影

孙复像

孙复，北宋官吏、学者。举进士不第，遂长期退居泰山讲学，被称“泰山先生”。他力学不辍，饱读六经。《吕氏春秋》中的《劝学》《诬徒》《尊师》《善学》诸篇所反映的尊师重教思想对孙复影响极为深刻，他说：“太学者，教化之本根，礼义之渊藪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仁宗时为范仲淹所荐，诏命为国事监直讲，宋仁宗对之甚为礼敬。





稷下学宫遗址

从一些史料看，您从少年起，思想就是比较开放的。据说，邯郸的文化气象大大吸引着您。当时的齐国以稷下学派著称，主要是儒家和阴阳五行学派。三晋地区有儒家，也有法家。秦国是一贯坚持法家传统，一直到秦昭王时代还是处于“无儒”状态。唯有赵国的邯郸，是包容百家的，这是否也是吸引您的重要原因？

吕不韦：这应该说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赵国的邯郸的包容百家，使我太向往了。当时儒家的主流之一是荀子学派。荀子是赵国人，他的主要活动范围就在赵国。特别有意思的是，荀况在赵国邯郸的时候，也刚巧是我吕不韦与异人在邯郸的那几年。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和法家学说的践行者李斯，都在邯郸生活过。著名的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子，就是赵国平原君赵胜的门客。其他如道家、墨家的代表人物也常来到邯郸讲学。这里是杂家的发祥地。这对我后来成为大杂家不能不说是—有影响的。

荀子雕像

荀子，名况，字卿，因“荀”与“孙”两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他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对重整儒家典籍有相当的贡献。

